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九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四期 ——
（二〇〇八年八月五日报出）

本期目录 （zk0808b）

【本刊启事】	必需揭露的伪文革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历史见证】	寻找林彪照片的酸甜苦辣	舒 云
【千秋功罪】	如何解读毛泽东：一个导论	
	——试论晚年毛泽东研究的四个层面	萧延中
【不堪回首】	最恐怖的1969年——我的心路历程	火 戈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本刊启事】

必需揭露的伪文革访谈录

• 本刊编辑部 •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了一本《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作者乃大陆作家师东兵。该书罗列了师东兵“采访”过的多位原中共要员，其中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原中共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原中共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原中共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等。由于该书作者师东兵特别强调，他本人亲自采访了这些人物，所以“访谈录”所述内容皆是真实可信的。由于该书的猎奇性，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并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然而，本刊编辑部近来接到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位家属的来函，称所谓师东兵对该四位原中共政要的“访谈”子虚乌有，乃师东兵本人无中生有的编造，故该“访谈录”纯属捏造。文革史的研究是史学界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特别是还牵涉到目前中国政治的走向，更来不得半点虚假。师东兵作为一个较有成就的作家值得人们的尊重，但是绝不可伪造历史，虚构根本就不存在的“访谈录”。历史不是小说演义，以假乱真、鱼目混珠只会将历史本来面目搅浑。本刊受陈、黄、吴、李四家家属的委托，特别刊登这一启事，以正视听。此外，陈、黄、吴、李四家家属依法保留对师东兵伪造所谓“访谈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法律追诉权。

~~~~~

## 【历史见证】

### 寻找林彪照片的酸甜苦辣

• 舒 云 •

在我和明镜出版社付出巨大的劳动后，这本精美的《林彪画传》终于在林彪百年之际问世。回想几年来寻找林彪照片的种种经历，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

想为林彪编一本画传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迟迟不敢行动，因为林彪存世的照片太少太少。客观原因是战争年代几乎没有照相机，但林彪从红军时期就是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要照相也还是容易的，偏偏林彪是个不喜欢照相的人。解放后，更是有了照相的条件，可是林彪长期休养，留下的生活照片不多。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出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除了公开露面被记者拍过一些工作照片登在报刊上外，别的照片几乎从来没有披露过，因为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基调是不宣传个人。更何况林彪是一个特殊人物，不仅仅是他的低调，也因为在十大元帅中，他是惟一没有寿终正寝的元帅，直到现在，林彪仍是反面人物。

九一三事件后，上边通知收缴林彪的照片。就是没有明文规定，谁还敢私藏林彪的照片？都在忙不迭地烧烧烧。50年代初林办工作人员刘桂莲曾带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儿子林立果去苏联，拍下两张照片，这时候赶快付之一炬。不要说曾为林彪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作为军队最高领导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得知九一三事件后，第一件事就是烧掉与林彪合影的照片。不要说黄吴李邱，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一样害怕受林彪照片的牵连。毛家湾留存的所有纸片都被抄走，汪东兴悄悄截下林彪与周恩来合影的照片，送周恩来自行销毁。

解放后，林彪没有和父亲林明卿住在一起，所以叶群怕老父亲想儿子，经常送去他们一家的照片。这样林明卿那里就有了很多林彪的生活照片。因为林明卿和女儿林宝珠住在一起，60年代初林明卿去世后，三大本相册的林彪照片由林宝珠收藏。林宝珠去世后，她的女儿陈慕琳继承了这三大本相册。九一三事件时，陈慕琳家住长沙，她的家也被抄了，三大本相册被翻了个底朝天。相册倒是手下留情，没被抄走。陈慕琳去世后，我在陈慕琳的儿子家见到这三大本相册。我一页一页翻看过这三大本相册，除了稀稀拉拉的几张林彪父亲和亲戚的照片外，大多是空相角。不仅林彪和叶群的照片一张没有，就是林豆豆和林立果的照片也没有。如果抄家人知道这相册里面的长胡子老头是林彪父亲，恐怕也会抄走的。

就这样，林彪家人所留存的照片全被查抄，至今仍没发还。

到目前为止，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选作接班人的林彪有一些和毛泽东的照片在网上流传外，其他的照片极少，林彪女儿林豆豆手中没有一张林彪照片。甚至可以说，留存民间的林彪照片几乎被一网打尽。

个别残留的林彪照片，也大多在林彪脸上打上了红叉。也有的合影照片，挖掉了林彪和叶群的脸，《林彪画传》中就有收有几张这样的留有遗憾的照片。

二

最初我的目标是搜集二三百张林彪照片。没想到在林彪家人和众多老摄影家的支持下，我陆陆续续搜集到几千张林彪照片。筛选工作繁重而吃力，删去重复的，不十分清楚的，最终《林彪画传》精选了一千余张有关林彪的照片，每一张都饱含着大家的心血。当然，这本《林彪画传》不是林彪照片全集，肯定还有相当多的林彪照片没有搜集到，比如被抄走的大量的林彪生活照片，只能等待以后增补。不过，《林彪画传》能达到目前这个规模，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难能可贵的是，《林彪画传》中相当多的林彪照片是第一次问世。

像林彪家人的一些照片，是林彪亲戚提供的。比如林彪父亲林明卿的照片，林彪和叶群的生活照，林彪一家四口的照片，以及林豆豆和林立果戴红领巾的一寸照片，以及林豆豆和林立果的手迹，都是林彪家人千方百计藏起来的，保留至今，真是很不容易，也担着极大的风险。

林彪秘书于运深和他家属提供了不少林彪、叶群与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以前人们对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貌。于运深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毕业生，感谢他以职业的习惯保留了这些珍贵的照片，使我们认识了这些被无辜卷进九一三事件的历史人物。

在《林彪画传》646页，有一张特殊的照片。1970年9月林彪和黄、叶、吴、邱在南苑机场观看空军歼八试飞表演。这张照片是黄永胜大儿子黄春光东藏西藏保留下来的，上面可以看到好几道明显的折痕。这些折痕没有用电脑处理，是故意保留下来的，就是想告诉人们这些照片的不为人知的沧桑。

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厅，他的护士长吴旭君正在倒水准备给毛泽东吃药，林豆豆站在毛泽东面前敬礼。这张照片是摄影家孟昭瑞拍的。

1970年国庆节，孟昭瑞以《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的名义登上天安门城楼，拍下很多“花絮”，比如毛泽东和吴旭君、张玉凤，林彪和江青，林彪和吴法宪、邱会作，林彪与叶群等照片，在文化大革命“正统”的当时，这些照片都不可能合时宜。这些照片被孟昭瑞压在箱底37年后，终于公开，照片中的当事人大多已经故去，令人不胜感慨。

孟昭瑞还提供了他主编十大元帅画册时挑选的林彪照片。《林彪画传》387页，衡阳人民欢送林彪；388页，武汉人民欢迎林彪；140页，林彪与林伯渠、叶剑英在延安窑洞前。151页抗大校长林彪；433页，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林彪与聂荣臻交谈；472页，林彪与沈阳军区领导人交谈……这些林彪照片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根据有关规定，任何档案馆都不能提供林彪照片。我不甘心，为了寻找更多的林彪照片，我来到《解放军画报》资料室。真令人失望！九大元帅每人都有厚厚的好几册专集，惟独林彪空空。我想，在九大元帅的影集中，也许我会发现漏网之“鱼”吧？果然在聂荣臻专集中，我发现两张集体照片中有林彪。其中一张收在《林彪画传》102至103页，这是1937年春，聂荣臻、左权、邓小平等人的合影照片。我感到其中一人很像林彪，因为照片很小，我决定洗一张。洗一张资料照片要一笔钱，据说某某社洗一张领导人照片的资料费是2000元，这还是很多年前的价格，现在不知涨到多少钱了。但是找到林彪一张照片不容易，我还是决定不管多少钱都要洗。175页这张参加七大会议的领导人照片，也是从《解放军画报》资料室聂荣臻专集里翻出来的，林彪坐在最右边。拿到印好的照片，我非常失望，所有的人都是全的，只有林彪的脸被切掉了大半。我去交涉，还不错，资料室让我拿着底片再去重新洗一张，这才洗出一张完全的林彪。

### 三

我第一次去潘家园旧货市场，就发现了有关林彪油画的一本小册子。这些油画在网上见到过，只不过不很清楚。所有的油画都没有署名，是海军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的。虽然不贵，我还是犹豫再三，没有买。我想通过海军的熟人打听作者，从作者手里翻拍下来就行了。没想到海军档案馆没有，当年海军政治部创作室画林彪的油画家一个也没有找到。无奈我第二次到潘家园，好多天过去，不知道这本小册子还在不在。我搜寻着记忆中的那个摊子，果然又发现那本林彪油画。这回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这就是收在《林彪画传》中的林彪视察海军的一组油画。

从国家图书馆，我搜集到不少林彪的图片和实物。像《林彪语录》，文化大革命时我都没有见过。各地印了一些，虽然数量比不上《毛主席语录》，但一旦开了口子，数量也不会少。但林彪不让印，已经印了的统统收缴。所以我有幸见到《林彪语录》还是40年后的国家图书馆。我惊喜地从电子计算机的目录上看到《林彪语录》，但我并不抱多大的希望，这种书根本不可能借出来。没想到真让我借出来了，一翻，全是当年歌颂毛泽东的革命词语，这几十年过去，依然“红色”不褪，看不出一点反动之处。这次准备《林彪画传》，我又专门到国家图书馆，再次顺利地借出《林彪语录》，正面反面拍了个够。这些照片都收在《林彪画传》中。

### 四

2006年4月，我去林彪父亲林明卿的墓地。林明卿的墓碑在九一三事件后被砸成四半，以后在林彪大女儿林小林的张罗下，墓地管理员用白水泥把墓碑粘好，重新竖立起来。刚刮过大风，白色的墓座上全是黄沙。庆幸也吹开了墓道上的满树桃花。墓地管理员告诉我，桃花也就开几天，我赶快拍了一组花开的镜头。

林向荣是林彪的小弟弟，1949年打太原时牺牲，时任副团长。解放后林明卿看小儿子林向荣老不来看他，就问，大家都瞒着他，但后来老人还是感觉到了，偷偷伤心落泪，但到死，林明卿也不知道林向荣牺牲的消息。这么多年过去，谁的手里也没有林向荣的照片，我在林家大湾的纪念馆也没有发现。林彪侄子林欣然告诉我，抗战时期他和林向荣一起去的延安，解放后他到处寻找林向荣的遗骨，最后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找到了。他曾经在那里看到公开展览的林向荣半身的大照片。以后林彪姐姐林宝珠的女儿陈慕琳一家专门去石家庄扫墓，但当时他们不知道有展览的林向荣照片，所以没看。我去石家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林向荣的照片拍回来。一大早我坐火车到石家庄，上午11点到了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很大，11点半陵园关门。我问了问门口，连跑带颠冲向陵园最里边，没想到陈列烈士照片的大厅成了骨灰堂，白跑一趟！我真是不甘心，一位骑小三轮车的老人告诉我，可以到陵园管理处问问。怕人家下班，我又拿出百米冲刺的劲头往陵园大门口跑。连问了几个人，还是晚了，资料员下班走了。再上班要到13点半以后。我算了算，如果运气好，还可以赶上14点半回北京的火车。我耐着性子在陵园大门口等，总算盼到资料员上班了。我们一起上楼，资料员问我，有人说林向荣是林彪的弟弟，是不是？我说是，她说他们都不知道。我说要知道了，林向荣的墓早被砸了。再无话，资料员很快打开柜子找出林向荣的小纸袋，只有一张二寸照片和一张底片。办公室太暗，我们一起来到楼外，我用数码相机拍了好几张。回来上电脑一看，还行，林向荣留存世上的惟一照片终于搜集到了。

### 五

为了寻找林彪照片，我跑了广州、上海、东北三省、武汉、天津、石家庄、北戴河、庐山……，拍了一些照片。北京自然更不必说，西郊机场、毛家湾等地照片都拍下来了。

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坠毁在什么地方？在所有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文章中，只说怀柔，但具体在怀柔哪里，不知道。我问时任专机师师长的时念堂，他说 1969 年形势紧张时为了选战备机场，他专门到怀柔去过，跑了整整一天，并且以后直升机在怀柔的战备机场训练过。所以陈修文肯定会选在怀柔的战备机场。

2006 年 10 月，时念堂师长和我一起去了怀柔。我们先到了怀柔县城，随便问了街头的几个人，好像谁都知道似的，告诉我们在怀柔西边。看来直升机迫降在怀柔是个大事件。顺山中新修的旅游公路向西走了一段，我们又问路边戴红袖章的防火员，他告诉我们顺着路一直向西北走。过了慕田峪长城，又走了一段，来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这就是渤海镇。在渤海镇渤海所，我们找到当年的支部书记邢天瑞，他带我们去看了坠毁的直升机现场和周宇驰、于新野自杀的现场。于是我拍下一段录像和几张照片。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机现场也许是第一次曝光吧？

顺着林彪的足迹，我最先去的广州，第二个去的是东北。去东北只用了三天时间，我坐夜间火车，第二天早上 4 点多到达葫芦岛。出站一打听，5 点半到塔山的小巴士就发首班车。也没有机会去看大海了，我在车站广场转了一圈，天蒙蒙亮，坐上小巴士。车上除了司机、售票员，只有我一个乘客。大约 20 多分钟到高桥，下车走不多远，路边是一个牌楼，进去就是塔山烈士陵园了。

一大早，陵园静悄悄，只有几个散步的老人。我望着海的方向，那也是当年国民党军进攻的地方，一马平川，能守住塔山，真是奇迹，难怪八位开国将军要魂归塔山。在中国所有的战场上，恐怕没有哪个战场像塔山这样让人魂牵梦绕。

离开塔山，我坐巴士到锦州，步行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完出来已经是上午 10 点多，这才发现还有一个“节目”，坐小面包车到锦州城外的辽沈战役指挥所。可惜班车上午下午各发一趟，上午这趟几分钟前已经走了。我来一次东北不容易，当然想看看林彪指挥打锦州的地方。我转了好几圈，不甘心地到门外，一辆出租车停下，我问了问价，决定坐出租去。辽沈战役指挥所在锦州城外的邱牛屯，现在正在开发成红色旅游点，还有演员扮作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指挥所门前表演，看的人不少。

回到锦州城已经是下午 1 点多，我买了张到黑山的汽车票。下午 3 点多到了黑山，没有去看黑山烈士陵园。我的目标是励家烈士陵园，这是黄永胜的纵队堵住廖耀湘十万大军的地方，为最后歼灭廖耀湘兵团创造了奇迹。我买了一张到励家的小巴士车票，到励家已经是太阳下山了。我沿着小路，走过玉米地，远远看到荒草丛中高大的墓碑。原来这里还有一个看墓的老人，后来也没有了，成了荒郊野外。几座墓上也长满了野草。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点，不知为什么，好像当地政府把这个地方忘掉了。

我在励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坐长途车到沈阳。接着我到四平，拍到了四平烈士陵园。看着满地悠闲散步的白鸽，真想不到 60 年前这里曾经激烈大战。从四平坐火车到哈尔滨，已经是夜幕降临。第二天我去了双城四野前线指挥所，遗憾的是这里正在装修。不过门前的四野站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哈尔滨住了两个晚上，我去了一趟太阳岛，拍了一些市区林彪住过的地方。然后我坐飞机回北京。本来是不想飞机的，我非常害怕坐飞机，因为飞机太不保险了。可是没有买到软卧，朋友给我买了一张下午回北京的机票。飞机晚点，有经验的人早早就改签了，而我是第二次坐飞机，第一次坐的还是军航的飞机，不懂可以改签。到后来广播可以改签，我才改签了另一架

回北京的飞机。如此一折腾，登机时已经是傍晚。你坐在飞机上，外面黑糊糊一片，根本不知道飞机到了哪里。只是到了北京，飞机下降，我才看到地面密密的灯光，甚至在半空中能看到流动的车灯。我这才体会到，九一三之夜，林彪坐在三叉戟上，如果事先没有告诉他到了哪里，他怎么知道是越过了国境线，到了蒙古？

想必坐过夜航飞机的人都会深有体会吧。

补记：

几年前，我采访过平型关战后为林彪医治枪伤的115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林彪画传》收有谷广善的近影。久未联系，2007年年初我想再次采访谷广善，得知他早就住进北京医院，不能动不能说了，只能放弃。6月29日，我还是与谷广善的夫人联系好，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望谷老，拍几个镜头。

还不错，在家人的大声呼唤下，谷老睁开了眼睛，眼睛闪着两星亮光。

谷广善生于1909年，河北高邑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虽然他为林彪治伤，很得林彪的赞赏，但他从未以此邀功。所以九一三事件，他在七机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并未受到牵连。

98岁的谷老一生坦坦荡荡，家人都希望他活到一百岁。

没想到，7月5日早晨，我与谷家联系时，得知谷老7月4日下午6点多走了。我拍下的那些镜头，成了谷老最后的影像。

~~~~~

【千秋功罪】

如何解读毛泽东：一个导论——试论晚年毛泽东研究的四个层面

• 萧延中 •

本文只是对问题的假设，而不是对问题的证明。换言之，我们的目的是强调“问题”的复杂性，并试图提出证明这些问题的若干可能性构想。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问题的复杂性

早在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就曾指出：“毛泽东（或毛主义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对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1〕这与其说是一个已被应验的预言，不如说是一个深刻难解的问题。作为一位精明且自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行为中的确存在着诸多令人费解的关键环节。换言之，他出人预料的想法和举动常常让研究者不知所措，左右为难。在非常直观的层次上，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结为一位孤独老人晚年之“潜意识”心理冲动的后果，似乎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就在这些表层“非理性”的背后，我们却又能清晰地看到毛泽东竭力追求的明确目标，这些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捍卫。因为，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支配力，包括制度控制和心理影响，都不是任何挑战者可以与之匹敌的。我们面临着的是一个太值得深入考察的复杂难题。

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研究的复杂性反映在如下几个相互矛盾、又共同组合的综合结构之中：一位精明至极的典型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深刻睿智的思想家和情绪激烈的伟大诗人；他拯救民族、追求平等的强烈意志与整体民族自我折磨的实际效果扭曲地联系在一起；如此深入地浸淫于传统典籍的熏陶之中，又把叛逆传统作为自己的价值体现和终生使命；〔2〕“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超越自尊，却又在时时向人们提示自己“只不过是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要为“被人看不起”的“贱人”打抱不平；那幽默潇洒、生动活泼的语言，竟会成为僵死“社论语体”的基础模板；前现代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完善理论，反而被后现代思想家视为“解构主义”的渊源，〔3〕……毛泽东晚年一次、再次地创造着悖论，给后人遗留下了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能不深究的问题。

显然，单一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足以全面地解释复杂问题。尽管在某一个层面上，某一种解释不仅不无道理，而且非常精彩，但其令人不能满足的地方则在于，相反的说法同样也可达到相同的效果。由于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行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我们必须避免单一解释的思路而另辟溪径。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把毛泽东晚年思想放到一个多层面的研究框架和长时段历史情境之中去考察。而这些不同的研究层面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正是使毛泽东成为毛泽东的精神底蕴；同时，这些层面之间的抵牾、冲突、紧张和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就没有甚么“复杂性”可言了。最后，当我们把上面的“同一性”与“紧张性”置入一个更大、更深的历史语境之中去的时候，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脉络可能会更清晰一些，甚至那种思想体系的根源会超越作为个体的毛泽东自身，成为近代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历程中的标志性里程碑。

这里，我们尝试着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和行为划分为“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心理动机”和“历史情境”四个角度的研究层面，最后尝试用“症候阅读法”对其进行初步的解读。

二、政治运动的社会意义

在“政治事件”的层面上，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据官方公布的统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的26年间，仅就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计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强，而地方一级的运动则要超出这个数字的10倍。〔4〕毋庸赘言，密节奏、高频率的集体动员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社会政治整合方式，这是另外一个议题。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这个运动旋涡中的核心运动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可能被清晰把握住的基本线索？

就其大端而言，建国初期的“理论学习”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目的显然是论证和普及新生政权的合法性，使人们在政治意识的深层次得到统一。但自以后，政治运动开始复杂化，大致可看出几个明显的波段：第一、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党内就产生了意见分歧；紧接着1956年的“党内整风”并连带引发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应当说，“党内整风”是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党内分歧而来的，而恭请党外人士提意见的本意是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而后果却反而招来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第二、当“反右”运动平息后，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再次“向自然开战”。运动后期党内再次出现分歧，于是爆发了“庐山会议”。以后是“中苏论战”，“修正主义”被提上政治议程。第三、1962年的“四清”运动普遍波及党的基层干部，社会“新阶级”的概念被提出。第四、是1966年开始“文革”，矛头直指被定义为“党内走资派”的高级领导层。

透过纷繁复杂的事件表象，研究历次政治运动的主题、节奏和频率，我们可以模糊地感觉到，一切变化和争论都围绕着“建构新国家的治理方式”和“对不同治理方式之性质的理解”

这两个问题而展开。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上看，前一个问题应归属于“政策—行政”的经验层面，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唯一执政党的地位，所以“党内”关于治理方式的争论，就自然超越了“治理”层次，变成了真正的“政治”问题。进而，“国家治理”（第一问题）就被“整党整风”（第二问题）所替代，成为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毛泽东本人则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概念来概括这个“核心”与“关键”。如果说1956年发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试图借助外部因素“整党整风”，那么，1962年“四清”运动则是启动党的上层力量清理党的基层组织，而“文革”则再进一步，发动全民、特别是普通民众对全党各级组织进行翻天覆地的彻底整治。

所以，在既定体制的机制作用下，毛泽东晚年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力，恰恰来源这一既定体制自身：对执政党内部之结构优化的不断需求和自我约束机制的强化调整。笔者认为，制度因素才是贯穿于复杂运动现象背后的社会本质。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那些社会运动看成是由这一国家组织结构所产生出来的功能。如果说，从根基上舍弃结构而仅谈功能，在理论上是本末倒置的，那么，就运动的功能而论运动的影响，也就等于同语反覆。

三、政治思想的逻辑结构

在“思想结构”的层面上，毛泽东晚年形成了一整套逻辑清晰且充满伦理色彩的政治理论。正如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的，毛泽东具有鲜明的“大众主义”（populism）情结，“人民”或“群众”的确被毛泽东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地位。他甚至断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我们怀疑这两条原理，那么就甚么事情也做不成了”。〔5〕显然，将“相信群众”置于“相信党”之前，并把它视为除此之外“甚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的首要“基本原理”，这不仅绝非语言排列上的疏忽或失当，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某种本质。

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阐发过这样一个思想：在旧中国，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实际上处于被统治的奴隶地位。由于政治实力的悬殊和理论水平的局限，作为“奴隶的人民”不可能直接、自发地推翻旧有的统治，成为“主人的人民”。他们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代表和“中介”，才能完成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转变过程。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中介”就是中国共产党。他反覆强调，“为甚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6〕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实际上充当着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其政治功能则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共产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能而且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在此，毛泽东明确表达了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但当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按照毛泽东“中介”理论的逻辑推演，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率领人民打碎了枷锁，赢得了解放，颠倒了被颠倒的政治关系，恢复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这样，在新型的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中，主人们可以自己制定自己的法律，自己选举自己的政府，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时共产党就完成了自己作为“中介”的历史使命，而应以一种新的政治因素在新的环境中发挥新的作用。因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环境，使毛泽东的政治理论内含着某种原则性突破的需求。

其实，毛泽东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除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外，毛泽东还在多次批示中严肃批评过“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小生产狭隘意识。1950年访苏期间，毛

泽东更是意味深长地对卡德尔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可能性”。〔7〕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通信和批示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他试图使“人民主权”的概念生活化的意图。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命题做了如下的解释：“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通过劳动者来讲，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8〕这种反映毛泽东深层观念的话语说明，他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生产力”最为本质的内在要素。基于此种理解，他始终关注着执政党的性质和功能问题，认为“党一群”关系是中国国家发展的核心主题。

围绕着这一主题，毛泽东反覆对党内官员“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的“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做了异常激烈的批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9〕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10〕从此以后，毛泽东对党的腐败现象的判断愈来愈严重。认为全国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其间“有一些坏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1〕最后，毛泽东认为党和政权都发生了质变，最终得出了非搞一场“革命”不可，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的结论，〔12〕以此阻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和修正主义在中国的无限蔓延。这样，毛泽东的全面逻辑构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图像，并沉淀在《五·一六通知》的语言和辞章之中，于是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政治实验。正如他自己概括的那样〔13〕：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即便在1976年病危之际，他还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甚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我们要革命呢。

不难看出，在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哲学思维中，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条逻辑线索：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已成为主人，但党阀官僚阶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成了“主人的主人”。因而，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人民再次沦为“奴隶”。“奴隶们”要想再次成为主人，仍然需要“中介”。在毛泽东潜意识中这个“中介”唯有自己。只有他自己才有足够的胆识、责任和力量，率领着“奴隶们”“踢开党委闹革命”，重新反压迫，“造反有理”，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副其实的国家主人，在具体的位置上实现抽象的自身价值，由此走向纯正的社会主义彼岸。

历史事实和研究结果都已证明，毛泽东上述理论体系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其中隐藏着巨大的悖论。〔14〕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这里，我们只是试图指出，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论自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毛泽东有他自己自信的理由。

四、个人心理特征的影响

在“心理动机”层面上，我们将看到一个极富魅力、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和耐人寻味之特殊人格的生动图像。从能读到的毛泽东文稿（包括公开发表的著作、即兴讲话、诗词作品、读书眉批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高傲、自负、“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度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渴望。这反映出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胆识和超越凡俗的视阈。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同时，通过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细腻、逼真的回忆录，我们又被告之，毛泽东体察入微，小心谨慎、揣摩至深，不易容人，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与其身份不大相称的狭隘。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虎气”和“猴气”在他身上共同有之。在心理学视角上，这两个毛泽东并不协调，时时冲突，呈现出持续性的内在紧张（tension）。但是，无论是极度的豪放，还是敏感的谨慎，其心理的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都是一个被充分放大的“自我”。用精神分析的规范术语表达，就是“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 syndrome）。〔15〕用通俗的比喻说，这种人格大喜大怒，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具有“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由于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张显，其实是弥合其高度疏离感的必要补充。

在心理学理论中我们知道，过于自尊的人其实也就是最为自卑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压抑往往会成为创新的动力。而在毛泽东的心理辞典中，“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等体现阶级属性的概念，往往成为“贫人”、“贱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字眼的同义语。50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钱崔使君序》一文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信笔写下了以下批语：“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16〕类似的态度就是在许多公开的会议上他也直言不讳。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讲“破除迷信”问题时，一连列举出近40多个古今中外、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物，用以说明“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17〕并多次强调，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1954年他支持李希凡、蓝翎反驳《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大人物”压“小人物”的不满。通读毛泽东当时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士的那封信，我们很难说其直接矛头是纯粹对着俞平伯本人的。〔18〕1957年，当曾经是“小人物”的李希凡在大报上批评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毛泽东又在这篇文章上批语道：“简单化”，“使人读不下去”。原因是“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表示这回他本人站在王蒙一边。〔19〕所以，把这两件相隔不远的事情联系在一起，仅从心理动机来说，毛泽东都是要表示出自己这个“大人物”要为“小人物”撑腰、说话的态度罢了。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堕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具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包含的无情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毛泽东晚年的大量论述中，这种“压抑—创新”的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毛泽东自信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前行的合理化途径，也就是通过释放压抑去冲破堕性的过程。“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关键就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在心理学的视野下，毛泽东又返回到了有血有肉、可能沟通的常人世界。这对深切体味他晚年思想和行为的动机，是多有裨益、不可或缺的分析层面。

真实的历史使上述三个层面的内容交叉融合在一起了。“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和“心理动机”有机联系，密切互动，从而构成一幅晚年毛泽东复杂而有序的思想画卷。

五、社会记忆与历史情境

周恩来曾精当地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巨大人物”。〔20〕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之历史过程的产物。如果说，所谓“巨大人物”是指其对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说，这种深远影响力的深厚基础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群体情绪息息相关。必须把毛泽东研究置入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之中，才能对其巨大影响力的民族情感渊源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

自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不可抑制的生产力一次又一次地破碎了中国“天朝圣国”的幻梦。一种先进文明的扩展却是以一个民族的屈辱为代价，这巨大的历史悖论正体现出马克思透视人类活动的深刻洞察力。在一个世纪的对外战争中，中国几乎没有在任何具有关键意义的冲突中取得过胜利，整体民族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特别是时距最近而耻辱最重的8年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难以弥合的痛苦和创伤。可以说，长期屈辱和压抑所积淀下的激愤，已内化为中华民族现代精神中的潜在气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曾有资本家变卖全部家产购买鞭炮，整整放了几天几夜。这在经济学上属于非理性行为的举动，实际上是再自然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就是这样一个饱偿屈辱的民族，当有人振臂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21〕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只要拼命奋斗就可能在数年之内“超英赶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那么，大跃进时期人们宁可砸锅炼铁，昼夜苦战，甚至“真实地造假”，除了制度的原因外，不正是涂尔干（Durkheim）所精彩分析过的“集体欢腾”（Corrobbori）的社会景观吗？〔22〕所以，当把具体的“社会事实”放到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的时候，思想的解释将发生变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诸如“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事件，就将可能得到超越表层之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在今天看来他的若干如此不可思议的超常举动之所以能得到响应，其实都是近代中华民族屈辱记忆的情感宣泄和自我幻觉之“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的必然反映。

与此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那时人们对毛泽东本人的“个人崇拜”。如果忽略掉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精神特质，那么，把这一愚昧现象归结为中国传统权威崇拜的持续影响，是极其合理的解释。但当考虑到近代中国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情境，我们就不得不说，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需要“卡里斯马”（Charisma）的时代。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讲，一种组织化的群体、一个政党、甚至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凝聚公共精神的符号，一个提供价值的认同的中心。某个群体越是处于弱势，越是面临艰难，这种对于公共政治符号的需求就来得越迫切，越强烈。〔23〕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中国社会是从传统王权结构转型而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是用一种现代政党的组织形态替代由于传统王权结构的崩溃而留下的权威空缺，加之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又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所以现代中国制度转型中渗透着旧制度遗留下的深层因素，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依据制度主义学派关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各个政治集团面对激烈的竞争，都必须建构自己的标志性政治符号，以此增强内部凝聚力。国民党选择了孙中山，而共产党则选择了毛泽东。所以我们说，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现象，是历史传统和现代需求之综合作用的产物。显然，这与人为制造政治符号假象的愚蠢举动，不可同日而语。在纯理论的层次上，这一现象是马克思阶级竞争学说、韦伯合法性类型分析和涂尔干宗教精神原理所共同探讨的对象，具有很深的意义内涵，值得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复杂的事物必须使用综合的工具予以解释。对于长时段具体历史情境的自觉关照，也正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黑格尔所谓“让巨大的结果从微小的原因发出”，用“轶闻奇事”解释历史行为的“常见的笑话”。〔24〕

六、“缺失阅读”：初步的分析

通过上述的层次梳理，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由四个要素共同作用的分析系统。下图表示了这个系统基本结构和内容：

历史情境：中国近代社会所形成的强烈压抑感，激发了整体民族自强自立的意志。民族自我实现的紧迫性，成为当代“中国精神”的内在灵魂。

形式	表层	中层	深层
事物分类	政治事件	思想结构	心理动机
1 9 4 9	开国奠基	合法性	成功自信
1 9 5 2	土地改革	主体奠基	初步实现
1 9 5 6	整风反右	政治限制	再次实现
1 9 5 8	大跃进	经济突破	高度冲动
1 9 5 9	庐山会议	高层争议	心理警觉
1 9 6 4	四清整党	新阶级	危机意识
1 9 6 6	文化革命	主体再现	最后冒险
层次类别	经验层次	逻辑层次	潜意识层
潜在主题	抑制腐败	主体身份	自我实现

缺失分析：以频繁的人事变动防范和治驭合法性危机（不是权力危机），但国家层面上的宪政建设和制度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明显空白。

第一，我们要把面对的研究对象和社会现象，放进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中去，充分考虑传统遗产和社会心态对群体之道德准则、思维方式和情感认知的型塑限定（formulation）。本质上，社会心智必然受到集体记忆和历史情境的制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是不存在的。

第二，我们从图表的整体角度看，显然 1 9 5 8 年“大跃进”把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属于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时期，我们称之为“外倾型”，亦即毛泽东的思考中心明显倾向于向外开拓；而后一阶段则属于合法性动荡时期，我们称之为“内倾型”，以后毛泽东愈来愈把问题归结为党内冲突、并把党与社会的关系提到了中心的议程。这样，“大跃进”就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分界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与行为，“大跃进”的兴起与失败，发挥着关键环节的作用，成为毛泽东晚年转变的最重要的动因，必须进行细致的具体分析。相对而言，目前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文化大革命”，则只是这一关键转折的逻辑后果而已。

第三，从横的方向分析，我们会看到三个层面各自具有不同的主题，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要素相关。“政治事件”相对来说是表层，呈现出无序的动荡起伏形态；而这种无序运动却实际受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结构的逻辑秩序所制约；毛泽东这种政治思想结构又是以其特殊经历和心理体验所形成的道德意识为基础。在这里，三个层面之间的互动和作用，展示出毛泽东复杂多元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状况之间的一致性。

第四，按照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symptomatic，也可译为“缺失阅读法”），思想家从未涉及的“视阈”（horizon）或论题，即被他省略而“缺失”的部分，恰恰是研究者应当深入分析的地方。在思想家观念中的“看不见”之处，其实极其明确地泄露出这一思想体系的本质。（25）从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明显看到，在三个主要的层次中，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建构和重塑方面，缺乏基本的原创性动力。政治关系的调整以行政人事变动为主要手段，而宪政体制的指导和制约，原则上处于空缺状态。或许正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相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自我力量，以至于他本人自认为具有完美逻辑的思路，在政治实践中则产生了严重的扭曲。这样，在被毛泽东晚年所“看不见”地方，我们所“读”出的明确信息是：缺失“宪政约束”的“民主意愿”，必然开启从“群众运动”走向“运动群众”的逻辑通道；放弃制度规范的高度道德责任，不足以构成追求善之目标的终极依据；“整体平等”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内洽关系，是困扰当代中国的首要政治哲学命题。

在历史天平的一端上，是一位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得到充分实现的个人价值；在历史天平的另一端上，则是一个千年大国在政治制度建构方面的整体缺失。由这二者所形成的矛盾和紧张，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过于凝重的社会记忆和耐人寻味的思考空间。

注释：

1.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Reign of Virtue: Leader and Par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Other Mat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孔子等中国传统经典的话要比引用马克思的话多四倍以上。其中儒家和新儒家作品占22%、道家 and 墨家作品占12%、民间传说、纯粹俚语占13%、其他中外作家，未分类占7%、马克思、恩格斯占4%、列宁占18%、斯大林占24%。。See, Vsevolod Holubnychy (1964), “Mao Tse-tung'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 *China Quarters* 19 (7-9): 16.

3. 参阅拙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即将发表。

4. 参阅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传说”的传说》（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页101。

5.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6.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页769。

7. 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

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11.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P. 32。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356—358。

13. 在《516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入9段重要修改和批语，此段是其中具有本质性的结论部分。

14. 参阅王振寰、钱永祥《迈向新国家？——民粹威权主义的形成与民主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0期（1995年8月）。

15. Lucian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6)。此书之中译本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6.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
17. 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
18. 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143。
19. 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2月16日）。
20. 〈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选集》上卷。
21. 毛泽东当时在政协讲话使用是“中国人”这一极具民族性的词汇，而不是“中国人民”这样具有明显阶级性的语言。显然，使用“中国人”来概括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民族身份认同的深刻内涵和整体历史记忆的厚重意义，联系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写的题词，这种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参见：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五卷。
22. 参阅涂尔干（Emile Durkheim）著，渠东等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二卷，第七章；亚历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编，戴聪腾译：《迪尔凯姆社会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3. 参阅：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增订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章绪论，页39—41。特别是其中对于希尔斯（Edward A. Shils）关于“卡里斯马中心”理论的解说。
24.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页221。
25.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著，李其庆、冯文光译：《读《资本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 原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二十一期 2003年12月31日

~~~~~

## 【不堪回首】

### 最恐怖的1969年——我的心路历程

• 火 戈 •

#### （一）

众所周知，1969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现全国“一片红”之后，继续政治极权打压颇为剧烈且最为关键的一年（即“一打三反”运动期间）。同时，对于笔者来说，它却是我自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罪，判处12年徒刑即将刑满的一年；也是我70多岁的母亲日盼夜盼，以为是盼到头的一年。可是，她万万不敢想的是，灾难深重年代中的事情，横生枝节会那么多，即将发生的变故，竟是那么残酷地不近人情！

母亲哪里会知道，她这个儿子所犯的“反革命罪”，在当时政治犯中，仅占万分之一还不到，并被难友们戏称为“戴红帽子的反革命”，即在后来的“文革”中，才突然“时髦”起来又多起来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但在“文革”之前，这确实是“奇货可居”的极少数案犯；照当年浙江省第一监狱政治科崔科员（王副监狱长的老婆）的说法，我是为数极少的“卖狗皮膏药”的反革命。这即是说，像我这样的犯案性质，必然为自己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埋下了“在劫难逃”的祸根！

正是由于我这一层性质的犯案，当苏共22大召开之后，监狱政治科有多人找我谈话，要我汇报思想；于是，我也不管那么多（其实想回避也不可能），就以汇报思想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支持，即：思想上拥护苏共22大的方针，拥护苏共对斯大林主义的进

一步揭发与批判，以及赞成对斯大林的移棺焚尸等等举措；同时，亦赞成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其“现代教条主义”立场的批评、谴责。……这样，无疑地气歪了王副监狱长等的鼻子。他们认为，这个小家伙思想反动透顶，难以改造，非对之严厉惩罚不可……。于是，一连串的惩罚措施，很快接而至——先是把我调出五金厂墙报组，后又把我从装包组调到锻工车间，不久，又调我到副业中队搞田间劳动，最后于1961年寒冬季节，再押送我到了钱塘江畔围垦总队的一大队（桐盘村），强制从事挑土劳动。……

就这样，从1961年始，至1964年初，我一直处在死亡边缘线上挣扎！这期间，多少难友死于水肿病（活活饿死），或被长期繁重的劳动，活活地累死！而我，大概因年轻与心态乐观，终于从死神怀里挣脱出来……。同时，到了这年的“年终评比”期间，中队部照例准备批斗我，不想这时，省公安厅派来的工作组，却微妙地保护了我……。从此，我感受到了中共党内某种健康力量的存在。随后，我虽然仍旧处在狱中，但境况的微妙改变，使我真可谓是“时来运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深入时为止。

“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约2年光景），中共政权内部斗争正忙；他们无暇顾及监狱（集中营）中的打压，在此期间，监内的管理，处于松懈状态。比如，我们劳动犯的行动自由度，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好”——平常出工、收工，基本上无队长带班，更无武警押送、监视；劳动任务凭着老犯人们的“自觉完成”……。所以，在分散劳动时，我们在一起的几个人，常常放声歌唱，比如：唱《怒潮》中的插曲——《送别》，以及《苏武牧羊》、《M江红》……。唱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下半年，这种“自由”状态结束了。于是，我这个明摆着的“修正主义的活教材、活靶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然而，当这年下半年开办大队第1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集中起来搞揭发与批斗）时，我没有被点名参加，但我们准组织的二个成员却被“点名”进去了。当他们“学习”结束放回中队之后，二人的精神状态大变——沉默寡言，平时尽量避开我们……。

这可想而知，他们在那种被隔离状态的恐怖氛围下，精神上的防线已被突破（从“毛学班”内传出的批斗呼喊声与惨叫声，已能预知一切）……。这显然令我等感到很不对劲。但是，在这高墙里头，状况是如此严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几乎等于零！故而，我感到已无能为力，感到在劫难逃！对此，其他难友均有同感，但都相互勉励，不丧气……。这时候，各中队之间，难友们已基本上不能互相联络，恐怖的气氛日浓一日！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感觉人人自危！

比如，当社会上大搞“三忠于”活动时，狱内的犯人们也被迫搞“三拥护”活动——每天早上，集体站在毛像前，做“早请示”：先唱《东方红》，接着每人手拿《语录》本，高举着齐声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晚上又集体做“晚汇报”：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接着再照着早上的动作，齐声高喊：……。这时候，我已被严加监视，每当大家齐声喊唱之时，中队长、指导员等人总会从背后悄悄靠近我，监听我是否在跟着喊唱……。又比如，开头中队部指令由我布置“三拥护”台，不想刚刚布置完毕，却突然指令其他犯人把它拆掉，再由别的犯人予以重新布置。……

于是，这一切使我更加明显地预感到，又一次大劫大难，即将临头！……

## （二）

这是1969年元旦过后，春节将至的冬天里。

在老家，泪将流尽的母亲，天天掐着指头数日子——盼望分离已近12年的儿子，能够按期归来。过去是，她数着年头盼儿归，现在终于等到可数日子了；过去，她盼着儿子能够提早回家；而现在，只要儿子能够到期归来，就感到很欣喜了。可是，在狱中的儿子，每每捧读家书，泪流如注！儿子深悉母亲苦楚无比的心田，怎不想着回家安慰她呢！无奈他清醒地感知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比严冬更甚……；故而，自己能否按期回家？实在是个颇大的问号！况且，他已越来越预感到，更加无边的苦海，正横在不远的前头……。

终于，难以言状的大劫时刻，来临了——这天早上出工时分，管教队长喊令我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并让我挑着东西由他押着出了高墙大门再进监管室。当我放下担子之后，立马就被他们带到大队部审讯室。在那里，早已等候着的人就更多——大队长、大队干事等等都来了，而且个个拉下猫脸孔，盯着我不言语。这时，见地上已经摆放着脚镣、手铐，显露一股十足的恐怖氛围；好在我已有思想准备，故而并不慌张，更不害怕。这时，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锁上手铐（土制的铁圈扣），随后把我按捺在地上，狠命地钉上了脚镣。之后又把我拉起来，推到毛像前，硬要我低头站着请罪……。旋即，他们锁上门，一阵风地全走了。他们走后，我马上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我一边就近察看、摆弄着这副生锈的铁镣，一边思考着……。

大约过了2个小时光景，他们又开门进来了；这时他们的脸上，显露出异常兴奋的狞笑。但见我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大队毛干事就吃惊地说：“你……你怎敢坐在地上？你这是蔑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罪该万死！”于是，专案组另一人员走过来，狠劲地把我拉起来，并凶狠地瞄着我说：“……再不投降，就砸烂你的狗头！……”。这时，我见毛干事把几张折叠的纸往桌子上一抛，一边坐下来问道：“邓焕武，你看看，这是什么？”，待我仔细一看，这原来是我藏在木箱夹层中的一篇文稿——《试论尼·赫鲁晓夫》。嗨，怪不得他们这么兴奋，原来已拿到了“罪证”，感到胜券在握……。

“这可能是我写的文章吧”？但我还是试探着回答。

“可能？……要不要打开再看看？”毛干事得意地说。

“不必了，我认得出自己的东西”。

“唔，怪不得你的反动气焰这么嚣张呀！竟然自封是‘国际共运的一支队伍’……”。

“那么，你以为你们是吧？……可惜，你们才是搞分裂出去的第5‘国际’。……”我反责道。

“……敌人若不投降，我们坚决不收兵！”他们齐声大吼。于是，其中一人过来捺我的头……。

“‘小铁托’，砸烂‘小铁托’的狗头！……”个别专案组人员还举着拳头吼着。

……

于是，我被打入了伸手不见5指的漆黑的禁闭室（这里是名符其实的“暗无天日”）！并且，一关就被关了整整23个月。……

### （三）

接连数天数夜的疲劳审讯，这叫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于是，我被迫改变了策略——迅速退却，即采取表面上认罪投降的样子。这就是说，我不再顶他们的嘴（据理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并承认手稿是我一人所写。由于内容重要，故而决定保存下来。其他还曾写过多篇文稿，但在“文革”开始时都撕掉了；且坦白了若干文章的题目，如《社会主义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灵魂》、《分裂的产儿》（针对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并书面交了几篇文章的基本内容，等等。



在审讯中，他们指着桌上的文稿问：“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主观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让同志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我如实回答。

毛干事又指着文稿上经人修改过的几处，问道：“这些是谁改的？”

而我说：记不清楚了。

于是他把文稿拿给我看，并说道：“字迹都还清清楚楚的，你怎么不清楚了？难道说，还以为我们找不到人吗？……”。于是，我拿着文稿，故意看了一会儿，慢慢道：“可能是徐敏改的，……可时间长久了，确实记不太清楚了”。接着，他们又一连串地审问：还有哪些人看过？他们有什么看法？你是如何进行组织的？等等，等等。

这时，我眼前一再显现着二位参加“毛学班”的难友在回队之后的窘态，且早就估计他们因顶不住批斗恐吓而坦白交代了。现在，我如果硬顶着已经无用，也不符合退却策略。于是，决定大事化小地“出卖”了这二位——坦白承认：文稿先后给这二人看过，但因文化程度低，理论水平差，他们看不大懂，……等等。

在极端严酷的“红色恐怖”气势下，谁若硬着头皮死顶，那只能是脑袋搬家无疑。那时，只因写点“反动日记”而遭枪毙的人，不是极个别。若与之相比，我被定为死罪，是明摆着绰绰有余的事。因为当时认定我的罪名，是所谓“长期在监内继续进行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因此，不讲点策略，无疑是不可取的笨斗。所以，在权衡利弊之后，我决定采取“投降”的退却策略——除坦白一些“犯罪”事实之外（我是为首者，而且大多是单线联系，主要“罪责”均在我身上，只要我不致死罪，那么，大家就可“留得青山在”），更多的是主动交代自己真实思想与政治观点。我考虑的是，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借此向党内健康力量汇报思想。我还思忖，如果省公安厅原来那种关照我的力量，仍然继续存在，那就一定会起某种程度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从“文革”毛派的角度看来，我这种大量“极端反动思想”的坦白交代，实际上是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路线的“恶攻”（恶毒攻击），那么，“交代”得越多，必死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我自觉知道，这实际上是把希望寄托于我认定的中共党内健康力量，而不是只因为贪生怕死。

例如，“……认为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现代教条主义大头子，是现代暴君。他背叛了列宁事业；几乎杀光了列宁的亲密战友！……”、“认为彭德怀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他是模范共产党人，他骨头最硬，性格最耿直，人格最伟大。……”、“认为铁托是当代的列宁，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革命导师；同时，他又是第三世界与不结盟运动的最为权威的政治活动家。……”、“认为南斯拉夫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各级”工人委员会“，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切体现。……”、“认为所谓的‘现代修正主义’，其实正是当代的马列主义。而且铁托同志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正确阐释者，……”、“认为把刘少奇打成‘中国赫鲁晓夫’正是他的光荣而不是耻辱！他和彭德怀等，迟早会得到平反昭雪！……”，等等，等等。

以上仅举数例。其实，我当时书面交代的真实思想观点，还有很多很多；由于这些观点早已陈旧、过时，因而，现在列举太多已无现实意义。不过，它作为历史的真实记录，还可值得一提。我之所以把它放在这里写，是为了说明，在当年那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恐怖下，笔者是万般无奈地选择了这种扭曲性的退却策略。其实，这种假投降、真攻击的做法，其冒险性显而易见，如果说，碰上握有生杀实权的死硬毛派分子，那就绝对休想活命。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策略是具有相对现实性的，因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作为“首犯”，我仅留监察看4年（等于加刑4年）；另有二位同案者，一位留监察看1年多一点，另一位留监察看大半年。如果1972年林彪事件不发生，我本来还可以早1年出狱“留场就业”（因该事件的发生，致使

本案重新被复查了1年)。

另一真实情况是，在毛派“文革”势力的“乘胜追击”与“穷追猛打”情况下，为了阻止没完没了的“穷追不息”的侦审，我还真的出卖了几位不太相干的难友（例如，揭发对方几句带有政治性的牢骚当作“反动言论”；再附带地揭发他到畜牧场偷窃鱼粉之类的违规等等事实，致使遭受批斗）！因为这样，可使专案组查无太大的“罪证”而罢休。但这种可谓“无辜殃及他人”的做法，一直受到我自己良心上的谴责！！……

上述实情说明，我终于“千方百计”地逃出了恐怖无比的“一打三反”死亡谷。

关于这种“红色恐怖”，在此笔者仅凭记忆，还原当年二组真实的镜头——

1、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期间，蒋堂劳改农场召开一次全场宣判大会。会场设在距离我们4大队（叶村）10多公里外的开化镇（场部所在地），各大队的犯人均被集中押到那里。可那天，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难走。而禁闭室里的犯人全带着铁镣、铁铐，身体极显虚弱；故而，安排每二人相互背靠背地坐在农用钢丝车（小型手拉车）上，由劳动犯拉着去。

到达会场入口处，各大队的所有钢丝车停在一旁，先让劳动犯们列队进去，之后突然响起一阵口号声，见约一连队的正规武装，跑步而出并分成二排，高举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架成“人”字形的一条长长通道，再喊令劳动犯们推着一辆辆钢丝车，从枪架底下鱼贯而入。会场周围，全是武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来回走动，在宣判台上的两边，还高高架着几挺轻机枪……。全场几万人，居然鸦雀无声，强烈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

当农场政委（是否是军代表，现已记忆模糊）宣布宣判大会开始，接着几名武装士兵迅速地押上二个被捆绑着的年轻犯人，他们均被强制地压着剃光的头，远远看去根本无法见其脸孔。立即，二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一人实际是判处死缓刑却被陪毙）……。从宣读判决书中得知，原来一个只因写“反动日记”，被加至死刑的；另一个是因呼喊“反动口号”吧（时间太久，记不确切了）！最后，将要退场之际，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随着这声枪响，让人感觉越加浓烈的恐怖气氛，迅速散向细雨绵绵的远方！……

2、禁闭室里的囚犯，整年累月不给理发、洗脸与洗澡。我刚进入时，虽然自己看不见自己，但在每次调换便桶时，却可以从门缝中瞅见经过门前的难友，可这一看，使人着实吃惊——竟然个个头发长得像疯子，毫无血色的瘦脸孔，大多惨白得像尸！一个个好好的人，都被禁闭成这种模样，这令人多么可怕！再想想自己很快也会变成这种可怕的样子，心里不免一阵难受与悲愁……。

大约过了大半年时间（后来知道是为了参加宣判大会），有一天出太阳的日子，意外地突然把我们分批地放出来，再带到水池边上，先理发，后洗澡。可是，有一位持杭州口音的年轻难友，大概是为了表示抗议吧，居然不肯理发，更不肯洗澡……。结果，被他们用皮带抽打得在地上翻滚嚎叫……。最后被绑了手脚，硬是把他的长头发给剃了个乱七八糟——看过去，一块白一块黑的“花花头”；并且，被刮破了头，处处出血！之后，据说又被推入水池，但他就是不洗澡，并且还叫骂不休。可后来，却突然哑了声（这使已回禁闭室的我们徒增恐惧气氛）……。直到很久之后才听说，当时他的嘴巴，被一块烂破布给塞住了（双手被绑着）。而且回到禁闭室，一直被扣着反手铐！……。

其实，类似的恐惧、恐怖镜头何止此二例！如宣判大会年年都有，但往年没有布置得如此极度恐怖。

又如，犯人遭殴打也是常有发生的，但我也未见下手如此狠毒的！这说明，“文革”中鼓噪起来的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已完全法西斯化。故而，一些人的人性已被严重扭曲、异化！

#### （四）

四大队原有的禁闭室，建在大伙房的后面；每间囚室设有二尺见方的小铁窗，故室内是亮的。可是，我们被囚禁的这边临时改设的禁闭室，不仅是室内空间很小，而且密不透风——除了顶层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出气孔，就只有小门上的缝隙可进一丝之气了！请试想，这比棺材好多少？于是，大队部专案组作了调整——把重案犯大多囚在这边，……。这也算是一种“区别对待”吧。

这边的房子，原来是大队医务室的几间病房，约半年前把它改作囚禁重案政治犯的禁闭室。每一大间内分隔为5个小囚室——小室内大约阔1公尺，长2。2公尺，高度约2公尺。禁闭室的外面，还装上了通电流的铁丝网；西北边还有一条水沟；而西南角，就是武装哨兵的小岗楼……。

黑室内每至冬天，水泥地上铺一些短稻草，稻草上再加席子。到了夏天，扒出来的稻草，同牛马栏中的烂草一样，散发出一股难受的霉气，而变成暗棕色的烂稻草中，尽是粘着蛆虫壳（热天从便桶里爬出来的幼蛆变成），再有便桶里散发出的粪臭，肯定更甚。可是，囚徒们常年处在臭气冲天的黑室中，却根本不觉（嗅）其臭！有时，不免疑问：真是人间吗？这究竟算是第几重地狱呀？……

这种禁闭室的所谓“管理”，显得极端恶劣与非人道的封闭方式，世所罕见！比如，以往正规的禁闭室，每日三餐开饭，均由伙房劳动犯递送，开饭时间也等于是放风时间——由管理干部打开门锁，每个囚犯可走到外边挨次拿饭菜……。开早餐时，先打水洗脸、漱口，有的还可以绕着天井小跑几圈。关禁闭期间也并非人人带镣铐；如若带手铐的，开饭时可以被打开……。总之，多少还算有点人性化。然而，“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前后，所有这一切全被废止。这时每次开饭，全由专案人员轮值着自己动手，而且大多毛手毛脚的，敷衍了事，好像越快越好似的弄翻了饭菜也不管……。并且一年到头不放风，不让洗脸、理发，也不让打扫卫生……。总之，比之对待牲畜都不如！

一般生病也不管，除非闹大病，如肚子痛得打滚，才有可能喊国家医师前来诊断一下，留下几粒止痛片之类的……。在我被禁闭的23个月期间，这里10个囚室，先后就死了二个难友！至于疯了的，咯血的，自杀未遂的，均见到过几个！

这里每次送饭时，先打开外门，再一个个地推开小门上的小窗；随后一个个递给饭盒与打开水（饭盒子是通用的，极不卫生；供开水是冬天一日一次，大热天一日二次）。但有的个别干部，冬天送饭就不给打开水，弄翻了饭菜也就算数，气得饿饭的难友过后大骂：“他妈的真不是人……”！而每餐饭菜的数量，减少至无能再少的了（小女孩也不够吃）！至于饭菜的质量，不堪言了……

在我关进去时，一段时间里大家互不说话，其实说话声音低了，相互也听不清楚，大声说话又不敢（门外有哨兵，后来才撤到岗楼上去）。所以，我只能与旁边囚室中的难友互敲墙壁，以此作为问候。后来，有位难友！从便桶的柄耳上弄下一截铅丝，再把它的一头做成弯钩，试着从小窗的边隙处伸出，慢慢地挑起小窗的铁扣（也能够返扣回去），于是小窗便可推开了。这一“伟大的创举”，令其他人特高兴，于是大家学效，终于都能打开小窗了。这样，只要把嘴对

着小窗口说话，不用大声，相互都能听清话音。

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可通话的小集体；于是每到晚上（或者早晨），就彼此闲聊，交流古诗词，轮流讲故事，互相猜谜语。由于打开小窗，射进了微弱的光线，于是，还可以下象棋（各人用草纸制成棋盘、棋子，下一步喊一声）这样，不仅减轻了孤独感与寂寞，也减轻了内心深深的苦楚！

那时，令我最感痛苦的是每每想起亲爱的母亲，这一痛苦真是不堪言说！每当此时，就仿佛似初入笼子里的鸟儿，想一头冲出来！但自从能够相互通话之后，思念母亲的次数相对减少了些，再是相互劝慰、逗笑话，故而，思念之苦也有所减轻……。

我处在靠外门口的第1室，故通话之后都管我叫“1号”，隔壁的为“2号”，就这么挨着往里叫“3号”、“4号”、“5号”。这样喊起来简单方便，又可避免互相问姓名。

我们虽然相互不能见面也不通告姓名，但彼此都很友好，闲聊很投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很多。后来我知道，“2号”是衢州地区人；“4号”是绍兴人；由于3室与5室曾经先后换过几位难友，因此留不下太深刻的记忆。

因我一直囚在1室，靠里边的难友们很长时间里无法见到我的“尊容”，他们对我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所以都说对我似乎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待到开宣判大会之后，他们回来说：“‘1号’，今天见到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于是我乘兴问道：“样子可怕不可怕呀？”不想他们却都说：“还好，……不大可怕”。我听了，心里苦笑不迭！因为，这显然是难友们的宽慰话，其实哪有“不大可怕”的呢？同是活棺材中的人，大家彼此彼此是也！

后来，5号囚室换了人，可是这个新来的难友始终不肯说话。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日他突然大喊大叫起来，且又哭又笑地吵闹不休。一连数天，没日没夜地闹着。这期间，他曾被拖出去用皮鞭抽打，但他好像不觉得疼痛，还是喊叫哭哭……。有一次，听到专案人员喃喃骂道：“这个家伙真疯了……”。

过了数日，他又一次被拉出来，但闹了一阵之后，叫闹声渐渐远去。从此，没有再回来。……

“疯子”被拉出去之后，又从西边大间禁闭室里转来一个难友，推入5号室。这位难友的声音，听着很熟悉，而且个性很开朗，一来就和我们拉上话。原来，他以前是大伙房的劳动犯，经常到各中队里来分饭菜，大家都认识他。而他被关禁闭的时间，比其他4人都早得多。由于性格外向，他每天说话最多，并且没有什么顾忌。他甚至敢讲自己的案情，称自己是在伙房组搞现行反革命……，才被关禁闭的。由于一直来抗拒交代，他至今仍旧被扣着反手铐呢！同时，他还敢于亮出自己的大名——洪XX（此人现今又处狱中，故在这里不公开其大名）。

在大热天里，他还被扣着反手铐，并且他的手臂粗大，使故而时间久了，铁手铐卡入烂肉里去，都长了蛆，但他不讨饶。大家关切地询问他，这样铐着怎么吃饭？……痛不痛？他可回答得很轻松：“……像狗一样爬在地上吃呗”。“时间久了，烂肉不痛了……”老洪说着像没事一样，可我们听了却难受极了！尤其当他说到手铐陷入烂肉里，蛆虫爬到手背上……。这时，我禁不住全身起鸡皮疙瘩！……

就在这种状况下，他每天讲的话，比谁都多，可谓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时夜深人静，老洪仍时不时地讲话，说话声音让岗楼上的哨兵都可听到。有的新来哨兵不知情，喊着阻止他说话，可是，老洪不予理睬，反而更大声地吼着：“你他妈的下来吧！”、“你姥姥的进来吧！”……。

请试想，一个人已处这种绝境，他有所畏惧吗？所以，老兵们懂得这一点，就听之任之（假装听不到）。而我们，自然很佩服老洪的硬骨做派，以及爽直的性格。但都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天轮到为人厚道的X干事值班送饭时，老洪果然乘着背转身抬手拿饭盒时，报告了X干事……。虽然，X干事说了一句“你自找的嘛”，就走了。但几天之后，X干事来开门要调换便桶时，真的打开了老洪的反手铐……，并且拿来1支消炎软膏与药棉之类的。他临走时，又对老洪说了一句话：“再不老实，再反铐”。其实，这种话是国家干部的例行话语，不能不说的。

说起X干事，我们都一致好评——他每次来送饭，动作很小心，生怕弄翻了饭菜；打开水时，总把每人的大杯子盛满了为止。谁若生病，也尽量等到X干事来了，才报告……。那时，开水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宝贵了；不仅是为了解渴，还要节省下来洗脸、洗脚（10天半月才可洗一次）。

据老洪说，最近西边禁闭室里，由于太闷热（西边屋日照更多），有一位咯血的病犯已是气息奄奄，估计将不久于人世。还有，我隔壁的“2号”，很久一段日子不见他说话，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之后才知道，原来他也发现自己咯血了！因而消沉得不想说话！……我听了之后，也是久久不能言语。试想，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境况下，我能找到什么合适的话语来安慰他呢！能找到的，无非是一些：“……想开点吧！”、“我们还是听天由命吧！”之类的空话！除此，还能有什么宽慰的话可以相劝？比如说，“2号”的今天（咯血），极有可能就是我的明天！那么，我除了听天由命，又能怎么样呢？然而，处在这种毫无主动性可发挥的绝境，“听天由命”的想法，却是含有积极性意义的。因为，它表达着一种内心尚存的乐天心态，即：既认命又要坚持到底的韧性。就艰难人生而言，这种韧性比什么都宝贵。

笔者深刻体会，尚存这种韧性，才有可望最终战胜人间邪恶与恐怖。例如，我那年迈且常年咯血的母亲，当她得知儿子又因“犯了罪”而不能出狱时，一下子气急得晕倒过去，从此卧床不起……。但她盼望儿子终可归来见上一面的坚韧信心，使她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